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李遇春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 NCET-10-0407

200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05JC750. 11-44041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中国当代 旧体诗词论稿

李遇春

2010 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李遇春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622-4548-3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古体诗—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②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262 号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作者:李遇春◎

责任编辑:李郭倩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新视点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海军工程学院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51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20.5

版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48.00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一

文学本无新旧之分，遽分新旧，皆因人力所致。但一分新旧，则宠辱随之，如杜工部诗云：“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由是，新文学得承百年之欢，旧文学渐失其宠，斯文其萎，形同弃妇。新旧诗命运之别，亦如是。揆之人情，不外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好事者附以世界潮流、历史趋势，俨然以新旧论主从、别生死，且因关乎文明发展、文化存亡、社会进步，其旨大矣。昔者胡适倡诗国革命，有死文学、活文学之说，衍为文学革命，以白话代文言，以西法为诗文，一倡百和，海内景从，文坛格局定矣。

然则弃者自弃，不弃者，自有人在。盖因诗文无论新旧，只在表情达意而已。然情有畅和、郁结之别，意有曲直、显隐之分，新体鲜能备善。宜各随所好，相题择体，不必强求一律。证之百年诗坛，新体虽占主位，旧体何曾缺席。且旧体好之者众，习之者伙，其中亦不乏文坛大家、学界耆宿、达官显宦、骚人雅士。观其诗，虽文约辞微，然志洁、行廉、旨大、义远，置诸典册，堪与新体比肩。因是之故，窃意当今诗坛，宜新旧并举，不可偏废其一。古韵今韵，皆自心出；新体旧体，莫非汉声。令隋珠楚玉各耀其辉，姚黄魏紫各展其秀，庶几可称盛世。

遇春性非好古，然雅爱旧体，年来广为搜罗，逐家精研，多

2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有心得。现裒为一集，问序于余。余突发奇兴，妄拟文言，戏为古语，以应遇春之嘱。倘能达意，亦证文言之未死，旧体之不当废也。

於可训

己丑春日书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序 二

中国现当代的旧体诗词，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被悬置在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认为旧体诗词是今人的创作，不属于“古代”的文学，因而不关注它；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认为它是“旧体”文学，不属于“新文学”的范畴，因而漠视它的存在。于是，似古似今、非古非今的旧体诗词，一直以来少有研究者问津。

除了狭隘文学观念的制约之外，窄狭的知识结构也限制了学者们研究旧体诗词的热情。识古者，多不识今；识今者，多不识古。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分工，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结构的天然缺陷。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不是很熟悉，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语境不是很了解，想要在短时间内取得研究旧体诗词的成绩不太容易；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旧体诗词的形式规范和艺术特征又并不在行，也就难以对它评头论足了。

对此，我本人就颇有体会。今年是现代著名女词人沈祖棻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沈先生生前就在我现在任教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执教。作为沈先生的晚辈，我很想写篇纪念文章对她表示敬意和怀念，于是在春节前后找来她的全集认真研读了一遍，她精彩的词作，时常让我感动和惊叹。可当我要写一篇文章来评论她的词作、

对她进行文学史定位的时候,却感到困难和踌躇。因为,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熟悉一群作家、一代作家,只有将这个作家放在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群中进行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定位他在文学史上的独创性贡献,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可能有一定的历史感。而我对与沈先生同时代的词人群不熟悉,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一时难以全面阅读与沈先生同时代的诗人、词人的旧体诗词作品,无法将沈先生跟同时代的词人群进行对比,因而也就无法将她放在现代旧体诗词的历史进程中去考量她的价值和地位,难以判断沈先生词作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哪些是她个人的独创、哪些是当时词人诗客共同的艺术追求。最后我只好改换题目,评论她的《宋词赏析》,因为我对 20 世纪的词学史有一定的了解,可以“瞻前顾后”地将《宋词赏析》放在 20 世纪词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来考量它的贡献和影响。所以说,知识积累的局限,往往会影响研究主体对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的选择。

本书作者李遇春教授是识今通古的年青才俊。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的博士,本行是做中国当代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因参与他的老师於可训教授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而顺便做起了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编年,从此就喜欢上了旧体诗词,并倾注心力来研究。

为了研究旧体诗词,他学会了创作旧体诗词,近几年来一直坚持创作。我清楚地记得,2007 年 11 月,我们一起到云南丽江旅游,我和他同住一屋。刚到宾馆安顿下来,他就拿出了一首丽江纪行的律诗,让我好生惊讶。2008 年“5·12”四川大地震期间,我们因为一种特殊的机缘而在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同事们在一起看电视,心情沉重地关注着灾区的救援情况,不一会儿,他就写成了几首抗震救灾的绝句,让同事们大为叹服。他笔下的诗,对诗词的格律规范和艺术美感都有很准确的把握。有了这样比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就能深入体会诗人的创作甘苦,准确理解诗

心词境,做到内行人说内行话,而不是信口开河。常见有的学者,谈起大理论是一套套的,玩起新概念是一串串的,可一旦涉及具体作品的优劣好坏,就顾左右而言他,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而遇春本来艺术感悟力就很强,加上有旧体诗词的创作经验,因而对作品的阐释理解就非常深入到位,多有会心之论。有时初读本书引录的原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待看了遇春的解读之后,才发现它原来竟是如此的高妙。

为了研究旧体诗词,遇春还尽力搜罗、收藏近人时贤的旧体诗词集。无论是别集、选本,还是相关研究著作;无论是名流大家的作品,还是“草根”作者的诗集;无论是公开出版物,还是作者自印的“山寨版”,他都概予收藏。他收藏旧体诗词集,执着而痴迷,不是遇着即买,而是主动出击,一有线索,就四处搜罗,必得之而后快。我被他的收藏热情所感动,曾将多年来积累收藏的前辈和友人签名赠送的数十种旧体诗词集悉数奉赠给他,因为我觉得,书要给需要它的人阅读,给有用的人收藏。香港中文大学黄坤尧先生编的香港著名诗人刘景堂的诗词集《刘伯端沧海楼集》,遇春多方求之而不得,于是央我向黄坤尧先生索取。黄先生收到我的电报后慨然允诺,不久就寄来了几大册。我转给遇春,遇春如获至宝,我也分享了他的兴奋和喜悦。我还代他向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先生索取过《今词达变》等书,也得到施先生的慷慨馈赠。在我认识的友人当中,遇春的藏书总量大概算不上是最多的,可他收藏的近人时贤的旧体诗词集却是最多的。这数百种旧体诗词集,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源,让他得以从容地饱览近人时贤的创作面貌,全面掌握现当代诗坛词苑的动态进展。我们在他的书中也不难发现,他既可以共时性地将任何一位诗人与同时的其他诗人进行横向比较,也可以历时性地将之放在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演进历程中考察其地位和影响。

为了研究旧体诗词,遇春又广泛阅读了中国古典诗学著作,从

《诗经》、《离骚》、汉魏乐府到唐宋诗词,从《文心雕龙》、《诗品》到明清人的诗话词话,从宏观的诗史著作到诗人的专论,他都有涉猎。熟悉了中国古代诗词、了解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成果,就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现当代诗人词家的诗词创作,所以,遇春总能够敏锐地发现每位诗人的诗学渊源,如数家珍般地指出他们继承的是哪位诗人的传统,效法的是哪个流派的诗法,在哪些层面上有创新,在哪些写法上有突破。遇春本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对于现当代作家的生平事迹自然是了然于心,对于现当代诗人的创作语境也有透彻的了解,有了这种通今知古的知识结构,就能够透视出隐含在旧体诗词中的诗人心曲,破译诗人在苦难年代里想要诉说又不能明说的心灵密码。诗中的弦外之音、词中的言外之意,他都能够感悟得到、分析得出。他借助旧体诗词的阐释,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诗人的心灵窗口,让我们走进诗人的心灵世界,去贴近那些曾经饱受苦难煎熬的灵魂,感受诗人无助时的哀怨、失望时的痛苦和他们抗争的勇气、生活的热情、人生的信念,领悟诗人们的生命经验和人生智慧。

遇春这本书,不是急就文章,不是应景文字,更不是心血来潮的产品。他有充分的准备、厚实的积累,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气,所以此书格外令人期待。我最近几年,对现当代的旧体诗词颇有些兴趣,也常常思考一些问题,期待着能在遇春的书中找到相关问题的答案。

我首先想弄清楚的问题是,“五四”时期有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早年极力提倡新诗,排斥旧体诗词,为什么到了中晚年,又重新皈依,写起了旧体诗词?比如,叶圣陶在20世纪20年代不遗余力地批判旧体诗词,说旧体诗词是“死文字”,是“形式的桎梏”,“要用它来批评或者表现现代的人生,是绝对不行的”,指责当时写旧体诗词的人是“骸骨的迷恋”,但到了中晚年,他自己却写起了旧体诗词。这种“勒马回缰写旧诗”的,不是个案,而是现当代文

坛上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有些早年写新诗的人,到了中晚年,也大力写旧诗,最典型的如臧克家和柳青等先生。这种否定旧体后又回归旧体的原因何在?是旧体具有挡不住的诱惑,还是某种文化心理使然,抑或是特定的语境在起作用?如果从文体功能及其演变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能获得怎样的启示?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总体成就如何?继中国古典诗歌之后,当代的旧体诗词是否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时代风格或艺术风貌?是否开拓出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哪些诗人最有个性?哪些诗作最有特色?

还有,像遇春这样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新锐学者,会以怎样的立场去看待当代的旧体诗词?会采取什么样的视角、方法去研究旧体诗词?会用怎样的观念去评估衡量这些旧体诗词的价值?他的立场、观念、方法、视角与我们研究古代诗词的又有什么不同?

读完遇春这本书,我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又产生了更多的期待。期待着他能在旧体诗词领域里进一步开拓,写出更多的专著,更期待着在这本书的引领之下早日“遇”到旧体诗词研究的“春”天!

虽然,当今的旧体诗词的文学地位还没有得到认同,但我相信,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旧体诗词总有一天能获得应有的地位。词在唐宋时期,作为新兴的词体,在好长的时间内也是被人瞧不起,不被认同。晚唐温庭筠好写词,被指责为“土行尘杂”,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五代和凝早年写词,晚年当上了宰相,被人讥称为“曲子相公”,无奈只好派人到处收集自己写的词作来销毁。到了北宋,宰相晏殊好写词,他的同乡后辈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为宰相,写小词可乎?”就连苏轼,一开始骨子里也是瞧不起词。当时人们喜欢张先的词,而不注意张先的诗,苏轼说这是好德不如好色。北宋文人自编文集,是绝对不把自己的词作放进文集的,因为词是“小道”,登不了大雅之堂。到

了南宋,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观念的变化,词的文学地位才得到认同。可是,在正统文学的观念看来,词体终究不如诗体,代表清代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词曲类总序就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直到20世纪,词体的文学地位才完全得到认同,取得了可跟诗体分庭抗礼的地位。宋词的许多作品,也被认同为可以与唐诗媲美的经典。唐诗宋词,分别作为唐宋两代文学的代表,已形成学界的共识。可见,有生命力的东西,终究是压制不住的——不论是少数人的排斥,还是主流话语的压制。

如今的旧体诗词,也遭遇着与当年的词体一样的命运。但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今人的旧体诗词,与古人的诗词一样,也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们对旧体诗词不遗余力地排斥打压,把旧体诗词逐出文学的殿堂,剥夺它的文学身份,吊销它的文学户籍,可它始终没有销声匿迹。从政府首脑、军队将帅到“草根”的平头百姓,写旧体诗词的大有人在,就连那些排斥者、打压者最终也向旧体诗词投诚,转而写起了旧体诗词。旧体诗词既有无数的创作者,又有广泛的接受者,旧体诗词的影响和光彩,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现当代的旧体诗词会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同,会昂首走进现当代文学史,拥有它应有的位置。遇春这本书,就为这种文学认同提供了基础。

在不久的将来,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都会登陆抢滩来开拓旧体诗词这块沃土。

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关注和研究旧体诗词,不仅是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开拓研究空间的需要,也是深化已有成果、求新求变的必然需求。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今天,已相当成熟,能够开垦的领域几乎全部涉及了,然而,20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有待开拓的富矿。在我看来,中

国现当代诗坛,一半是新诗的天地,一半是旧体诗词的世界。这厢是新诗人占据着主流位置,大张旗鼓地探索;那厢是旧体诗人在边缘位置自得其乐、默默耕耘。只有以开放多元的眼光,对新旧诗坛予以同等的关注,才可能完整地呈现 20 世纪诗坛的全貌。中国现当代诗坛,如果缺少了旧体诗词这半边天,绝对是残缺不全的。“五四”以来,对旧体诗词的价值、创作方法的思考和争论,也从来就没有断过,对此我们可以进行现代诗学理论的考察。旧体诗词的创作者众多、作品丰富,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纸质传媒和电子传媒的多元传播,使得旧体诗词的文献形态更趋丰富和复杂。仅在文献的调查和整理方面,就有许多工作可做。而关于旧体诗词名家的艺术个性、旧体诗词的流派社团、发展历程、价值地位,又该有多少题目可做!旧体诗词的研究,绝对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领域,谁先动手,谁就抢占了先机。而遇春这本书,就是得风气之先的拓新之作。

从微观角度研究 20 世纪的新文学作家和诗人,特别是研究“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和诗人,也不能不关注旧体诗词。因为,很多新文学作家和诗人,都同时写旧体诗词。新文学和旧体诗词,都是同一诗人对人生的感受、对社会的认识。而旧体诗词,更是在某种特殊环境里,特别是在不便于创作新文学的环境中的一种创作方式的转移,一种不得不写的替代性的创作,像沈从文、胡风、吴祖光在“文革”期间写旧体诗词就是典型的案例。不观照作家所写的旧体诗词,就无法全面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生活环境里的心态情感,离开了旧体诗词这扇心灵的窗口,就不可能洞察诗人完整的心灵世界。遇春这本书,就提供了很多例证。要深化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不研究旧体诗词。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登陆旧体诗词这片沃土。

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当今的旧体诗词也是不能不关注的。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可以不关注新诗,

因为新诗相对于古代诗歌而言,是脱胎换骨了的异质异型的文学,但是,绝不应该不关注当今的旧体诗词,因为当今的旧体诗词与古典诗词完全是血脉相连、同质同型的。如果说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诗史长河的上中游,那么,当今的旧体诗词就是这条诗史长河的下游。研究诗史的发展流变,仅仅研究上中游,而不关注下游,那么对诗史的走向流变就不可能完全看清楚。这条长河被人为地截断,绝对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价值观的偏离。过去由于学科专业的划分,古今诗史被人为地截断了,现在是该打通古今诗史长河的时候了。

研究古代诗词的接受史时,不能不关注当今的旧体诗词。诗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更在别人的作品中。我们要了解古代诗人、诗歌的生命力,就不能不考察他在后世的接受情况。近年来,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渐成热点,成果越来越多,但似乎很少有人将接受的视野延伸到当今旧体诗词中来。而今人对古典诗歌的接受,更能见出古典诗歌的生命力、延展力。遇春这本书,在考察现代旧体诗人的时候,非常注意考察他们的诗学传统和师承接受,为中国古典诗歌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具体的接受个案。

遇春这本书,是一个华丽开端、一次高温预热,预示着旧体诗词研究的春天和热潮即将来临!

聊书感想于上,权以为序。

王兆鹏

2009年5月18日于湖北温泉

前 言

一

旧体诗词研究近年来看似较热闹,但热闹的背后其实颇为寂寞。目前,研究旧体诗词的学者主要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而以现当代文学为业的学者则很少涉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学者在旧体诗词研究领域里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就专著而论,出现了王林书、张盛荣的《当代旧体诗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王小舒、王一民、陈广澧的《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施议对的《今词达变》(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7年版),吴海发的《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梦芙的《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自然不能算多,如果与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的整体成就相比,就更显单薄了。在以上论著中,除吴著和胡著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史著外,其余诸种都是散论的结集。施著中收录的《百年词通论》是宏观而厚实的专论;刘著中收录的《“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古色古香,纵横点评百年词坛风云,时见吉光片羽。另有文艺美学学者刘士林,著有《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用现代学术方法

治旧体诗词,惜乎理念先行,断语时常过当,故难免招人议议。

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黄修己、钱理群、刘纳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知名学者已经开始重视20世纪旧体诗词的研究。黄修己不仅写过《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粤海风》2001年第3期)一文,主张恢复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而且在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还收录了胡迎建执笔的《“五四”后中华诗词发展概述》,但只是将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未能让旧体诗词正式登上现当代文学史的“大雅之堂”。钱理群则与袁本良合作编注出版了《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钱理群还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正名。刘纳是新文学学者中最早研究旧体诗词的学者之一,早在1991年她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上发表过《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一文,反响很大。1998年由她主编的《清末民初文人丛书》十卷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同年她的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她的开拓性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旧体文学(包括旧体诗词)研究的进程。1999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又推出了由知名现代文学学者孙中田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丛书,周氏兄弟、郁达夫、田汉、刘大白、茅盾、王统照等的“诗词解析”悉入其中,颇为学界瞩目。进入新世纪,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尤其是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一些新文学学者开始对旧体诗词持比较宽容的学术立场。但从整体来看,由于大部分新文学学者有意无意地还固守着“新文学”本位的文学史研究,以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大门对“旧体诗词”几乎还是关闭着的。许多人热衷于争论旧体诗词的所谓“合法性”,即要不要研究的问题,至于如何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则是一味回避。无论如何,旧体诗词已

经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的诗人词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其诗歌成就不说令新诗人汗颜,至少也可让他们不再那么狂妄。姑且不说陈寅恪、吴宓那样纵横诗坛的学者大家,仅就新文学家而言,如闻一多所谓“勒马回缰写旧诗”的人就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文学史界会正视他们的诗歌成就,因为谁也不可能永久把持着所谓的“文学史的权力”,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观念,没有旧体诗词位置的文学史肯定是不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我不理解为什么如今很多现当代文学学者一提起旧体诗词还会“谈虎色变”。如果说在“新文学”的主流位置还没有得到确立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文学革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而坚决反对“旧文学”(主要是“旧体诗词”)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那么“五四”以来,“新文学”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从“旧文学”那里夺得了正统的文学地位,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宽容地承认“旧体诗词”的文学位置了,要不就显得“新文学”太没有雅量了。况且从历史上看,词兴诗未亡,曲兴词未亡,同理,新诗兴,旧体诗词也不会亡。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 1958 年对梅白说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①是很有道理的。同理,臧克家当年宣称“新诗旧诗我都爱,我是一个两面派”^②就不仅仅是代表他一个人的兴趣了。有意思的是,许多老一代新文学家都承认旧体诗词的地位和价值,而且他们还是旧体诗词的写作者,就连邵燕祥这样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诗人也提出了新诗和旧诗“双轨制”^③发展的主张,且有《打油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一册印行。相反,我们这

① 梅白:《要发展,要改革,打不倒》,参见张贻玖编《毛泽东和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1 页。

② 《臧克家全集》第 9 卷,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7 页。

③ 邵燕祥:《非神化》,花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3~88 页。

些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按说本应该更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却固执地不承认旧体诗词的地位,这就颇有些耐人寻味了。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所谓“现代性”情结的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成了现代性的化身,而旧体诗词则沦为了现代性的“反动”。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上曾经登载过一组文章,总题为“‘现代性重估与现代文学研究’”。吴晓东在他的文章里认为:“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局限了应有的更广泛的对象以及更开阔的视界。”^①因此,他提出以韦伯的“价值无涉”立场把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看成一个中性化的时间概念,祛除或者剥离其中隐含的价值倾向,从而让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学样式回归到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中来。但是,王富仁很快撰文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体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可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②由此,围绕旧体诗词的学术争鸣,基本上成了“超越‘五四’”与“保卫‘五四’”、“反思现代性”与“坚守现代性”之间的对立。20世纪90年代的争鸣是如此,新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争鸣还是如此。这种争鸣似乎还将继续下去,由于双方所持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立场的不同,这种争论似乎也不可能取得什么“共识”。

当然,目前的旧体诗词研究中还有一派是“否定‘五四’”和“反对现代性”的。一般而言,主张“超越‘五四’”的学者并不简单地否定“现代性”,他们主张给旧体诗词一个文学史的位置,但同时并不

^① 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②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